



老子秘语

◆ 齊魯書社

◆ 尹国兴 著



老子秘语

◇ 齊魯書社

◇ 尹国兴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子秘语/尹国兴著. — 济南: 齐鲁书社, 2006. 8

ISBN 7-5333-1681-9

I. 老... II. 尹... III. ①道家②老子—研究

IV. B223.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60301 号

老子秘语

尹国兴 著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 250001)

<http://www.qlss.com.cn>

E-mail: qlss@sdpress.com.cn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.75 印张 2 插页 230 千字

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33-1681-9

B·220 定价: 19.00 元

自序

一、《老子列传》中的古《书经》

《老子》一书的来历，《史记·老子列传》给出了一则史实与传说杂芜的小传。其曰：

老子者，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，姓李氏，名耳，字聃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

孔子适周，将问礼于老子。老子曰：“子所言者，其人与骨皆已朽矣，独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时则驾，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。吾闻之，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骄气与多欲，态色与淫志，是皆无益于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，若是而已。”孔子去，谓弟子曰：“鸟，吾知其能飞；鱼，吾知其能游；兽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为罔，游者可以为纶，飞者可以为矰。至于龙，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子，其犹龙邪！”

老子修道德，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。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关，关令尹喜曰：“子将隐矣，强为我著书。”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终。

或曰：老莱子亦楚人也，著书十五篇，言道家之用，与孔

子同时云。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，或言二百余岁，以其修道而养寿也。

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，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：“始秦与周合，合五百岁而离，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。”或曰儋即老子，或曰非也，世莫知其然否。老子，隐君子也。

老子之子名宗，宗为魏将，封于段干。宗子注，注子宫，宫玄孙假，假仕于汉孝文帝。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，因家于齐焉。

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，儒学亦绌老子。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岂谓是邪？李耳无为自化，清静自正。

这则小传首先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。老子对孔子说：“子所言者，其人与骨皆已朽矣，独其言在耳。”意思是说，你说的这些人（指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等古代圣王），他们的人早就死了，连骨头都腐烂没有了，只是他们的话还在罢了。老子有此一说，语义尽管平淡，听起来却怪异得很，令人惊撼。我们知道，死人是不能说话的，人和骨头都早已腐烂了，就更不能说话了。但是，他们说的话还在，这显然不是说他们的鬼魂在说话，也不是成仙不死之类，而是说他们的话被记录下来，因而依然存世。

由此可知，老子对孔子说“子所言者，其人与骨皆已朽矣，独其言在耳”所指实是一部书。中国至少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完善的文字体系，古代圣王的话至春秋时如果还在，必定已经形成文字，记载于典籍之内，而不仅仅是口头的流传。老子的这番话表明，历史传说中的古代圣王曾经是有著作传世的。

中国是一个注重历史的国家，为了承传历史，自古就设有史官制度，传说中黄帝即已下设史官（仓颉造字，相传仓颉就是黄

帝的史官)。到了夏朝,史官有太史,掌管记事和册籍。及至商代,史官在文献中有史和内史,在甲骨文中有大史、小史、东史、西史等。史官常在商王左右,掌记事,遇事也可以发表意见。此外,还有守藏史,专门管理档案。可见,殷商时期史官的职责分工已经十分细致。到了西周,史官有内史、太史、御史之分。太史为太史寮之长,掌立法、记事,同时参与机要,对朝廷提出建议。内史,又称大史、作册内史、大内史等,负责代天子起草任命诸侯大夫的简策。御史又称柱下史,与商代守藏史职务相当。从上古三代及至春秋,其间虽政权偶有更迭,但史官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一直是完整存在的。

到了春秋时期,老子担任了周守藏室的主管。周守藏室的职能,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国家中央档案馆,其中保存了上古至春秋时期一批珍贵的国家历史档案,是后世了解先秦历史的第一手材料。老子的守藏史之职,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档案馆馆长。因为职务关系,他对馆藏情况应该是十分了解的。尽管老子距三皇、五帝、三代圣王的年代已经十分遥远(老子距伏羲氏约 3500 年,距神农氏约 3000 年,距黄帝约 2200 年,距尧舜禹约 1700 年,距成汤约 1100 年,距文王、武王、周公约 600 年),但因为史官制度的支持,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一批人在专门从事历史档案的记录、整理和保存工作,古代帝王的言论和思想流传几百年乃至几千年是完全可能的。现在,老子对孔子说古代圣王的话还在,那就是还在。对此,我们不必怀疑。

据此可知,老子所说的“独其言在耳”,是指记录帝王和大臣们有关国家大事的言论和政令的档案,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古《书经》。由老子所言判断,古《书经》确实存在,而且到老子担任周守藏史之职的时候保存还比较完整,但后来这部书佚失了。《史

记·五帝本纪》称：“《书》缺有间矣，其佚乃时时见于他说。”可见，《书》之缺佚当是发生在老子之后、西汉之前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：“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，事为《春秋》，言为《尚书》。”按照这一说法，周守藏室保存的历史档案是《尚书》的前身，应当是后世儒家作《尚书》所必备的，孔子及孔子弟子必须及时占有这部分史料，才可能续写古史而作《尚书》。但是，因为这些材料存于周，是周王室的收藏，而孔子居于鲁，尽管后来有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的经历，但显而易见，老子不可能因为他是孔子而把王室的东西送与他，所以孔子生前不大可能得到这些材料，也不大可能由此而作《尚书》。《庄子·天道》称：“孔子西藏《书》于周室。子路谋曰：‘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，免而归居，夫子欲藏《书》，则试往因焉。’孔子曰：‘善。’往见老聃，而老聃不许。”《庄子》书，多有寓言故事，并非是历史事实，不过，此处称老聃不许孔子藏《书》却应是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的。在孔、老之间展开的这场周王室典藏文献争夺战中，孔子及孔子弟子并不会取得胜利。

古《书经》初为周室所藏，人们很难把这部古《书经》和后来的《尚书》对应起来，二者实际上应是两部书。根据已有的知识，《尚书》有一部分并不是直接来源于国家档案的收藏，而是后世学者在没有充足原始材料的情况下所追诉的作品。而且，从老子所讲的情况看，学者追记的时间一般不会早于春秋。可见，《尚书》作为“国史”是有其缺陷的，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古史的真实面貌。

既然如此，追查老子所说的这部古《书经》的历史下落就显得极为重要了，它是正确认识中国上古历史的基础文献。谈起这批国家档案的历史下落，只有两种可能性：要么失传，要么仍然存世。这批国家档案先存于周，后来周为秦所灭，于是并入秦

国,除了自然耗损之外,即便后来它能幸免于秦始皇焚书之祸,亦难逃秦末楚人一炬之灾。这样,以失传解释似乎是合理的。但是,另一方面,通过《史记》所载老子的说法,我们注意到,古《书经》春秋时存在于老子手上,而老子为史官,有责任为后世保存下这批珍贵的国家历史档案。况且,老子本人是有著作存世的,就是今天的《老子》。这样一来,古《书经》存世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。那么,古《书经》究竟是否存世了呢?《老子》与古《书经》是什么关系?《老子》是由老子本人自著,还是老子为了使史料存世而进行的编著?还是仅仅是收藏、保管了前辈的作品,既未自著也未编著?《老子》书与老子人是什么关系?要回答这些问题,就必须进行调查。

二、穷举法排查

老子对孔子所言“独其言在耳”无疑是指一部书,问题是是哪一部书,是不是传世的书。

穷举法是一种有效的数学方法。用这种方法不仅可以确定这批国家历史档案是否存世,也可以帮助确定是哪一部传世文献。其具体做法是首先把先秦典籍的存世书目收集齐备。如果这批历史档案仍然存世,必然居于其中。然后根据已有的知识将其中的条目逐步排除。如果全部排除了,则说明该书已经失传了;如果该书依然存世,则基本可以确定具体是哪一部书。

《周易》,成书甚早。其思维的雏形始自于伏羲氏所作八卦,其后历代曾有增益,自文王始成六十四卦,后孔子为其作序。《周易》的思想出于古代帝王,经历了史官的整理和保存,但它并不是言论的集合,体例不符。据此排除。

《诗经》，是古代诗歌总集，经过了孔子的删定。史官、乐官在整理和保存这部总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其间也可能成为周王室的收藏，但其不足以承担国史之沉重。且《诗经》来源于下层劳动群众，而不是帝王，故可将《诗经》排除在外。

《尚书》，是儒家所传记载帝王行事、言论和思想的历史典籍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：“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，事为《春秋》，言为《尚书》。”其言之凿凿，称古代记言之书为《尚书》。按其意，老子所称“独其言在耳”应为《尚书》无疑。但是，孔子适周时《尚书》尚未成书，老子固不知其后会有此一书，即若孔子本人也未必知道其后会有此一书。《尚书》成书应是战国以后的事情了，故而此书肯定不是《尚书》，亦可以将其排除。

《春秋》及《春秋》三传——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、《左传》，儒家代表著作。《春秋》，本是春秋时期各国史书的通名，后专指孔子所编定的《春秋》，为编年体史书，记载了春秋时期鲁国的历史。三传，为《春秋》的三种传授本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称《春秋》为上古帝王记事之书，实是牵强附会之辞。《庄子·天下》曰：“《诗》以道志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礼》以道行，《乐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”称《尚书》为古代记事之书，《春秋》是名位本分之书。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称：“孔子曰：‘六艺于治一也，《礼》以节人，《乐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诗》以达意，《易》以神化，《春秋》以道义。’”称《尚书》为记事之书，《春秋》是道义之书。《春秋》不堪载国史之重，且其为记事，而非记言，体例不符，故老子所言不可能为此书，因而排除。

《管子》，春秋时期管仲著，后世有所添加。管子曾任齐相，彼卒后，齐国遵其政者数百年。为诸子之学。老子所言必非此篇，可以排除。

《孙子》，春秋时期孙武著，兵家专著。老子非指此书，可以排除。

《国语》，国别体史书，记言为主，记载了春秋时期八国的历史。老子所说非是此书，可以排除。

《战国策》，西汉末年刘向整理中秘书编定而成，以国别为基础，三十三篇，记载了战国时期十二国的历史，年代已经晚出。老子所言非是此书，可以排除。

《论语》，孔子及孔子弟子的言论集，儒家经典。老子所言必非此书，是以排除。

《礼记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，儒家经典，成于战国时期，年代已晚，且皆非记言体，体例不符。老子所言亦非此书，于是排除。

由是，尚可以排除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鬻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晏子》、《尹文子》、《商君书》、《慎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吴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纵横家书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孙臆兵法》、《黄帝阴符经》、《黄帝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六韬》、《关尹子》、《邓析子》、《子华子》、《鬼谷子》、《鹖冠子》、《尉繚子》、《尸子》、《於陵子》、《文子》、《公孙龙子》、《孔丛子》诸家之作。

《老子》，相传春秋时期李耳著。李耳，亦称老聃，后世尊为老子，曾为周守藏室之史。老子对孔子所称之书与《老子》有直接关系，或直接就是《老子》本身。

这样，把先秦时期的传世文献排查一遍，最后只剩下《老子》一书。排查的结论是：老子言“独其言在耳”所指的那部书要么久已失传，如果至今依然侥幸存世，其必为《老子》无疑，非是他书。

三、《老子》作者之争

由此可见,《史记·老子列传》四百余字的小传实际上记载了《老子》一书来源的五种提法。

第一,《老子》为老子的前辈所辑撰,记载了上古圣王的言论和思想,是国家历史档案的遗存。依老子“子所言者,其人与骨皆已朽矣,独其言在耳”之说,其所指之书即是今天的《老子》,《老子》在孔子适周时久已成书。

孔子曰:“述而不作,信而好古,窃比于我老彭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老彭,郑玄注曰:“老,老聃;彭,彭祖。”姚鼐、马叙伦是其说,认为“老”即老子,并多有考证。孔子“述而不作,信而好古”源自于老子、彭祖,说明在孔子的观念中老子并无著作,只是在传承祖先的思想,这一点与司马迁所记老子之言正合。韩非子曾在《解老》中直称《老子》为《书》,说明在韩非子眼中,老子未曾著书,《老子》即是古《书经》。《墨子·贵义》:“昔者周公旦朝读《书》百篇。”《荀子·劝学》:“《书》者,政事之纪也。”《荀子·解蔽》:“好《书》者众矣,而仓颉独传者,壹也。”其所指之《书》皆与《尚书》不符,应是对《老子》的称谓。清代道光年间,陕西周原故地出土了大盂鼎,铭文记载了西周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孟的史实,其中有“女(汝)孟召(绍)荣敬攢(雍)德经,敏朝夕入谏”的记述,已经涉及了“德经”,说明《老子》至春秋时期成书已五百年之久,非是老子自著。

魏源《老子本义》称:“删书断自唐虞,而老子专述皇坟以上。”是说老子思想起源甚古。张智彦在《老子与中国文化》中说:“从前考察老子思想的渊源大多追溯到夏商周三代,现在看

来老子思想的渊源还可以上溯到原始氏族公社时代,老子思想是扎根很深、起源很古的中国文化的一支。”这些研究结果从一个侧面说明了《老子》并非是史官自著之书,而是史官辑录的上古圣王言论和思想的典籍。

司马迁所记《老子》来源的第一种说法,是说《老子》只是在传承前辈帝王的思想,未曾由史官自创。《老子》书是由老子的前辈辑撰而成,其真正的作者是古代帝王,至老子时久已成书。

第二,《老子》为老子自著。史官老子自己写了《老子》这部书,是其个人的创造性成果。老子生于春秋乱世,对世道大失所望,于是自著虚无不为之书五千言,以明其志。

第三,《老子》为老子同辈人老莱子所著,其著书十五篇,成于春秋时期。

第四,《老子》为老子的晚辈后学太史儋所著,老子即太史儋。西出函谷者,为太史儋,时间考订为公元前 374 年。关尹子强迫其“著书上下篇,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”,显然是说太史儋自著了《老子》,成书于战国。

第五,《老子》为战国关尹所作。郭沫若持此说,认为“关尹”即“环渊”,系方言“一声之转”。他又引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所述“环渊,楚人。学黄老道德之术,因发明序其指意,著《上下篇》”之说以为证据。

郭店楚墓竹简《老子》出土后,一些学者认为,《老子》系老子与其晚辈后学所共撰,出于老聃和太史儋二人。此说非史记旧闻,为当世学者之发挥,姑且列为第六种说法。

“子所言者,其人与骨皆已朽矣,独其言在耳”,老子对孔子说的话交代了《尚书》之前古《书经》流传的情况,这则史料对于正确认识《老子》其书至关重要。它提供了《老子》的体例、成书

时间、作者等史家梦寐以求的信息。在《史记·老子列传》所载的各种说法中,第一种说法最为诚正可信,这一说法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古文献的支持。《管子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史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孙子》、《礼记》、《素问》、《庄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列子》、《慎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文子》、《淮南子》等古籍中都曾使用《老子》的言论或思想,却不言出于《老子》,而是说出于三皇、五帝之书,或言出于上古圣人,或直言《老子》为《书》。他说或许未足可信,但此处老子自己也说《老子》书出于上古圣人,这就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。世之知《老子》其书者莫过于老子其人,《老子》之书从何而来,老子自己应该是最清楚不过。而且,从多个角度看,老子应确有其言,才被司马迁收录在案,而非太史公或后世之人所杜撰。因此,《史记·老子列传》中的寥寥四百余言,足以对后世学老子之学者构成参考,是我们了解《老子》一书身世的核心史料。

四、《老子》作者身份之辨

通过对文献史料的研究,老子对孔子说“子所言者,其人与骨皆已朽矣,独其言在耳”应指《老子》,这是一个合理的结论。那么,其所指的那部书究竟是不是《老子》呢?光有文献的记载还不够,具体的还要在《老子》书中寻找答案。

如果《老子》就是传世的古《书经》,其作者的正式身份应是帝王,而不是史官、学者或普通的百姓之类。《老子》书中很多地方使用了第一人称“我”、“吾”,这为判断作者的身份提供了直接依据。如果是老子自著,《老子》中记述的应是老子个人的言论和思想;如果是老子编著了该书或仅仅是保存了前辈的著述,

《老子》中记述的则是古代圣王的言论和思想，为王者之说，“我”、“吾”的身份是帝王。史官是社会分工的一种形式，有其社会职能的限制；而帝王的社会职能要宽泛得多。这种差别实际上很大，在字里行间应该能够以此将其身份辨别出来。

为了方便论述，现在把《老子》中涉及第一人称的章节录制于下，对其身份逐一进行分析。

吾不知谁之子，象帝之先。（第四章）

“吾”不能表明作者的身份是史官。

宠辱若惊，贵大患若身。

何谓宠辱若惊？宠为下，得之若惊，失之若惊，是谓宠辱若惊。

何谓贵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，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

故贵以身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；爱以身为天下，若可托天下。（第十三章）

“吾”与“寄天下”、“托天下”成上下文，可知“吾”身份之重，当为一国之君，而非史官。

致虚极，守静笃。

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复。

夫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曰静，静曰复命。复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

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王，王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没身不殆。（第十六章）

“吾”与下文的“容”、“公”、“王”、“道”、“久”、“没身不殆”处于同一语言环境之中，说明“吾”的身份不是史官，是帝王。

太上，下知有之；其次，亲而誉之；其次，畏之；其次，侮

之。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。悠兮其贵言。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谓我自然。（第十七章）

“我”与“百姓”成上下文，“百姓”为“百官”之意，说明“我”的身份不是史官，应是帝王。

唯之与阿，相去几何？美之与恶，相去若何？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

荒兮，其未央哉！

众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春登台。

我独泊兮，其未兆；如婴儿之未孩；

累累兮，若无所归。

众人皆有馀，而我独若遗。我愚人之心也哉！沌沌兮！

俗人昭昭，我独昏昏。

俗人察察，我独闷闷。

众人皆有以，而我独顽且鄙。

我独异于人，而贵食母。（第二十章）

此章“我”的身份与“众人”、“俗人”、“人”相对，独立于众人之外，其身份是帝王，不是史官。

自今及古，其名不去，以阅众甫。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？以此。（第二十一章）

“吾”为第一人称，不能说明作者的身份是史官。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地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远，远曰反。（第二十五章）

与上相同，“吾”为第一人称，不能说明作者的身份是史官。

将欲取天下而为之，吾见其不得已。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。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。

夫物或行或随；或歔或吹；或强或羸；或载或隳。

是以圣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（第二十九章）

“吾”与“圣人”成上下文，表明其作者的身份不是史官。根据文义，此章盖为伊尹答成汤之辞，“吾”应是伊尹自称之词。

道恒无为。侯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。镇之以无名之朴，夫将不欲。不欲以静，天下将自正。（第三十七章）

“吾”与“侯王”、“天下”成上下文，表明作者的身份不是史官，而是帝王。

人之所教，我亦教之。强梁者不得其死，吾将以为教父。（第四十二章）

此章讲政教，应是圣人之教下，非史官教下，表明“我”为帝王，非史官。

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。出于无有，入于无间，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。（第四十三章）

此处“吾”不能说明作者的身份是史官。根据此章文义，描述的是战法。作战非史官之职，应是帝王及其重臣的言论。

圣人恒无心，以百姓心为心。

善者，吾善之；不善者，吾亦善之；德善。

信者，吾信之；不信者，吾亦信之；德信。

圣人在天下，歙歙焉，为天下浑其心，百姓皆注其耳目，圣人皆孩之。（第四十九章）

此处“吾”与“圣人”、“百姓”成上下文。“善之”、“信之”，非史官之能，表明其作者的身份不是史官，是帝王。

使我介然有知，行于大道，唯施是畏。（第五十三章）

“我”，不能说明其身份是史官。根据文义，此为谤谏之辞，

“我”为国之重臣。

故圣人云：“我无为，而民自化；我好静，而民自正；我无事，而民自富；我欲不欲，而民自朴。”（第五十七章）

“我”，是明述圣人之言，身份是帝王无疑。

天下皆谓我大，似不肖。夫唯大，故似不肖。若肖，久矣其细也夫！

我有三宝，持而保之。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

慈故能勇；俭故能广；不敢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长。（第六十七章）

“域中有四大，王居一焉”，此处自称“我大”、“器长”，又言战事，可知此章是史官所记古代帝王的言论。

用兵有言：“吾不敢为主，而为客；不敢进寸，而退尺。”是谓行无行；攘无臂；执无兵；扔无敌。

祸莫大于轻敌，轻敌几丧吾宝。

故抗兵相若，哀者胜矣。（第六十九章）

此章言战事。第一个“吾”为引用古圣遗言，第二个“吾”可以表明作者的身份。历史上，史官皆为文职，并不具有领兵打仗的职能，既不曾临战，就不可能“几丧吾宝”。说明作者的身份不是史官，而是帝王。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

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夫唯无知，是以不我知。

知我者希，则我者贵。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。（第七十章）

“我”、“吾”与“天下”、“圣人”成上下文，表明其作者的身份不是史官，是帝王。